

吳縣文史資料

(六)

叶圣陶題



09

21(5007)



目 录

献给解放四十周年

回忆新四军难友在苏州的一次绝食斗争

-曹剑萍口述 顾耿深整理 (1)
在解放浒关镇的日子里 吴鸿海 (8)
参加抗日和赴缅作战回忆片断 胡永宁 (11)
在北伐西征中 范式正 (16)
东西山同乡会与“东联社”、“金联社” 许 骏 (21)
“启明星”在黑夜里闪烁 《教育志》办公室 (24)

——记抗战中的黄埭启新中学

- 回忆黄埭乡师的有关史料 朱恶紫 (27)
鹿村小学的革命斗争 费燕治 (31)

人 物 春 秋

- 金家凤生平事略 华永义 (43)
万里浪迹话故人 冯英子 (53)
——记金家凤其人
朱穉丞同志生平传略 薛利华 杨维忠 (62)
忆父亲 朱 梅 (65)
革命妈妈王季凤二三事 沈鹏年 (68)
吴永泉传略 严修桢 (74)
纪念罗焕章先生 徐志刚 费燕治 (79)
我的父亲费怀芝 费燕治 (83)

进步青年作家沈圣时	严修桢	(88)
吴县潘家与孟鼎克鼎	邓愚	(96)
昆曲名票王茀民	严修桢	(100)
著名刺绣艺术家沈寿	李嘉球 黄惠中	(103)
中国近代刺绣艺术大师沈寿	桂秉权	(111)
清代吴县藏书家考述	王染野	(117)

吴苑医林

漫谈浒关医林人物及其事业情况	吴鸿海	(131)
民间良医吴氏疗科	潘泽苍	(138)
怀念殷季达医师	吴鸿海、许松涛、严达川	(141)
金里千医师二三事	许松涛 严达川	(144)
名医汤逸生传略	严修桢	(147)
朱元善堂药铺史略	潘泽苍	(151)

风景名胜

姑苏华山天池山	金云良	(155)
甫里八景	严焕文	(173)
叶圣陶纪念馆散记	邹志一 张嘉翼	(179)
三山古遗址的发现与发掘	张志新	(187)
太湖流域的史前定居者	姚勤德	(198)

勘误与更正

回忆新四军难友在苏州的一次绝食斗争

曹剑萍口述 顾耿深整理

我于1946年2月为生计问题经朋友介绍到苏州相门狮子口江苏省第三监狱工作，先是当看守员，后提升为副主任看守。

当时是抗战胜利不久，第三监狱里关押着八百多名囚犯，其中绝大多数是汪伪汉奸犯。如第二号大汉奸陈公博，在“礼”字监第一号囚室里只关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就在监狱内东边的小花园里秘密枪毙的。第四号大汉奸褚民谊囚于“礼”字监第二号囚室，他比陈公博晚八十天枪毙。这两个大汉奸枪毙时，都由主任看守姚企文和我把他们从号子里提出来，并押赴刑场的。汪精卫老婆陈璧君判的是无期徒刑，关在女监第一号囚室内。还有汪伪吴县末代县长陈展如，他的父亲陈福民是汪伪江苏省高等法院院长，他的叔父陈则民是汪伪江苏省省长，都羁押在“礼”字监。

第三监狱的囚室分为礼、义、廉、耻、病、女六大部分。“礼”字监也称“特别监”，共有十三间囚室，关押的都是经过最高法院特种刑庭判决决定案的汉奸犯。“义”字监有十八间囚室，九间一排，共二排，门对门。朝北一排的九间关着二百多名经江苏省高院一审判决、尚未经最高法院特种刑

庭终审判定的汉奸犯；朝南一排九间，关着皖南事变中被俘的151名新四军难友和十几名一般政治犯。

这151名新四军难友，是从南京押解来的，按当时的体例应当关在胥门外的陆军监狱里，但那里已人满为患，因此就“寄押”在第三监狱，都没有判决。我到第三监狱当看守时，他们早已在那里了。他们大多操苏北口音和浙江口音，看样子很贫苦，也没有人来接见他们。我当时26岁，身强力壮，血气方刚，头脑虽然简单，但爱国心还是很强的，民族意识也还是很强烈的。我认识他们中间好多人，时隔四十余年的今天回想起来，对两个人的印象最深刻：一个是江苏泰州人，叫滕小良，是新四军三师的政工人，曾经领导过新四军难友的绝食斗争，他斗争性极强，天天痛骂国民党，被囚禁于一间三个平方米的独居室内，戴手铐脚镣；还有一个叫张一鹤，广东人，30岁出头一点点，是新四军三师某团的政委，戴一副金丝边眼镜，很有风度的。我同他经常隔着铁窗聊上几句。他说他非常欢喜看报纸，但没有钱买，要我每天把报纸上登的内容讲给他听听。我说，我没有看报纸的习惯。我当时想，吃官司的人大概太空闲了，就用看报纸来解解闷吧。所以我以后就经常把汉奸囚室里的《文汇报》、《苏州明报》、《文萃》等报纸拿几张出来，给他看。

一天下午，张一鹤用试探的口气请求我给他送张字条出去，我欣然答应了。傍晚时分，我便按他的要求去天赐庄望星桥下塘街一座朝西的小洋房内把字条送给了一位女士。门牌号码、该女士的姓名（记得只写了“某小姐”有姓无名）及具体的字句现在都记不准确了，内容只有一句话，要

求她来接见一次。该女士中等身材，穿一件旗袍，看上去打扮很讲究，30出头一点年纪，因为是傍晚，光线不明，面貌看不清晰。她的一口京片子说得很流利，使人难以判断出她的乡音。她没有叫我坐。我送完字条就离开的。第二天上午，果然有一位女士操着一口广东话以“张一鹤的同乡”的身份来接见的——是不是就是昨晚的那位，我无法判断。隔了一些日子，她又来过一次，以后就再也没有来过。

“义”字监里汉奸犯的生活是很不差的。他们吃的是白米饭，一天三顿非但顿顿吃饱，而且几乎天天有荤吃，有好香烟抽，看报纸，读小说，经常有说笑声从他们那排号子里飞出来。“礼”字监是特别监，那里的汉奸犯简直逍遥得很：一天三餐由家属或请人送来，还可以送一次点心；衣服脏了，由家属拿出去洗；白天不锁监门，可以自由走动、串门子……。这151名新四军难友的生活就苦不堪言了。一天两顿糙米饭，每顿每人一碗，饭重老秤二十两，根本吃不饱。菜？大多数日子是没有的，只是偶然有些咸菜或一勺子青菜汤。他们几乎个个都是一文不名，根本不象汉奸犯那样，个个有钱。两排囚室，门对着门，中间只隔着一条露天弄堂，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铁窗生涯。

新四军难友天天对着窗口骂汉奸，一天要骂好几次。汉奸们照例是不敢还嘴的，只得夹紧尾巴，竖起耳朵听。骂到激烈处，还呼口号“打倒汉奸卖国贼！”、“打倒专搞阴谋诡计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新四军万岁！”。据说在我到第三监狱之前，在一起放风时双方打过一次群架。肥头胖耳的汉奸当然斗不过铁骨铮铮的新四军勇士的，二百多名汉奸差不多全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所以后来

只好分开来放风。监狱当局的态度是，只要不出乱子就万事大吉，喊喊骂骂是不去多管的。

1946年7月1日，我同看守员陶寿康正在“义”字监值班。上午九点刚敲过，也就是给新四军难友号子送第一顿饭的时间。饭桶摆在各个囚室的铁窗下，只等监狱信号响就开饭。“叮铃铃……”一阵电铃响过，突然从张一鹤的那只号子里飞出“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的歌声，顷刻之间传遍了其它的八间号子。这歌声是那样的雄壮、激越、有力而又有气势，唱得又是那样的整齐、和谐，好象有一双无形的、巨大的手在挥舞着节拍，指挥着千军万马驰骋在疆场。

这歌声震撼了整个庞大的第三监狱。监狱长陈松年和看守长叶瑞庭两人神色慌张地急急跑来，对着新四军难友号子大声吼叫：“停！停！不准再唱！再唱拖出来枪毙！……”叶瑞庭对我吼了一声：“好好监视！”说完，他俩一溜烟跑了。事实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经验告诉他们现在最紧要的应该是做什么？

大约过了十分钟光景，国民党驻苏州卫戍司令部202师伞兵部队全副美式装备的两个班开进了监狱，在“义”字监的露天弄堂的两头各架起了一挺轻机枪，端着卡柄枪的伞兵沿着围墙巡逻，空气顿时紧张万分。但新四军难友号子里的歌声却越唱越响，唱完《新四军军歌》便唱《义勇军进行曲》，最后唱《国际歌》，三支歌唱完就呼三声口号，呼完口号又继续唱歌，……他们全然不理睬铁窗外面杀气腾腾的场面。

歌声和口号声彼此有秩序有节奏地交替着。饭，没有

动一动，又一次绝食斗争开始了。

监狱长陈松年、二科科长韩毓文、看守长叶瑞庭、主任看守姚企文和我，一共是五个人，分头站在这批难友号子的铁窗口，劝说他们：“身体要紧，有话先吃了饭再说好了……”这时，伙房早已把糙米饭换上了白米饭，每个号子前一桶，热气腾腾的，妄图以此来引诱他们，但他们就是不理睬。

劝说无效。引诱无效。陈松年他们只得走开了。我叫伙房给他们每间囚室拎桶开水去，对张一鹤说：“喝点开水吧？”张一鹤在铁窗内向我举了一举手。于是，我吩咐伙房，每隔一、两个小时就给他们送一次开水去。

傍晚，歌声、口号声又起，彻夜未息。全副美式装备的伞兵队通宵巡逻未停，第三监狱自己的一个警备连也未敢稍歇。这一夜，整个监狱里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不准睡觉。

第二天早上，一个伞兵上尉对陈松年说，事态看来仅此而已，监狱外面未发现任何动静，估计不可能有其它大的举动……。这两个班的伞兵，就这样撤走了，暂时驻扎在大门外的对面。

上午，陈松年请张一鹤到监狱长办公室谈判。韩毓文、叶瑞庭、姚企文和我都在场。张一鹤当即提出三条：一、根据“双十协定”无条件释放 151 名新四军难友；二、释放前，每天增加一次放风，天天借给报纸看；三、改善伙食，每顿每人增加半斤饭。

陈松年说：“你们先复食好了。这三个条件我保证马上向上峰请示。”语气是很温和的。

张一鹤表示，不答应这三个条件，坚决绝食到底！

第一次谈判就这样崩了。

第二次谈判我不在场。

7月3日下午五点多钟，陈松年叫我去把张一鹤“请”来，进行第三次谈判。

张一鹤先开口：“没啥多谈的，答应就答应，不答应就不答应。不过，要是饿死了我们一个人的话，你监狱长非但鸟纱帽要摘掉，国民党当局不会感谢你，而且，我们共产党方面也会有人找你算账！你们诸位”张一鹤向我们迅速地横扫了一眼，“恐怕也不会……”他的话没有说完，只用头向我们微微地点了几次。

陈松年说，第二、第三两条可以答应，立即执行。第一个条件，连省高院都不敢作主，要向司法行政部请示，“看来没有十天半月是不会有答复的。我看你们还是先复食，过一段时间看有无答复再说吧。”

张一鹤沉思片刻，说：“让我去和同志们商量一下再说。”

陈松年一看事情有了松动连忙讨好地说：“我看不必了。张先生完全有威望独自来决定这个问题的。”

张一鹤即提出：“去掉滕小良的手铐脚镣，仍旧把他放到大号子里来。这个权力在你监狱长手里，不必要向上峰请示的。否则，我们坚决不复食！”

叶瑞庭插话：“这是另外的问题，……”

“这个不难。”二科科长韩毓文连忙打断了看守长的话。

于是，陈松年顺水推舟，就同意了。

陈松年在抗战前就是第三监狱的监狱长。抗战时期，

他蛰居苏州调丰巷家内当寓公，日伪方面多次请他“出山”，他都推说“有病”。胜利后又出任旧职。1947年8月，因黄胆肝炎病逝于博习医院。二科科长韩毓文是地下党，解放后任上海某区人民法院院长。看守长叶瑞庭不是个东西，江苏省高等法院院长兼审判长孙鸿霖是他的娘舅，他就仗着这股势力在第三监狱内横行霸道，他经常向囚犯敲诈勒索，经常辱骂和刁难这批新四军难友。

绝食斗争胜利后的第二天，《苏州明报》即在第二版“本市新闻栏”内作了详细的报道。不料，引起轩然大波，社会舆论大哗，原来重庆谈判的《双十协定》已签订了半年多，国民党当局竟公然背信弃义到如此程度，扣压战俘，虐待政治犯。京沪各小报也纷纷以《公理何在》、《道义何存》、《要不要讲点点信誉》等等为题发表短文、杂评。中共南京办事处据此向国民党最高当局正式提出交涉。大约在这年的中秋节前后，这批151名新四军难友才分批被释放了。释放时，监狱当局发给每人一套旧的美式军装，没有给路费。张一鹤临走时告诉我，说是释放出去的人都到苏北去的，去找“自己的”部队的。滕小良是最后一个人走的，时间大约在1948年的夏天了。

在解放浒关镇的日子里

吴 鸿 海

1949年4月25日，是浒关镇解放的日子，至今已有40周年了。回忆浒关镇解放前后的情景，真是感慨万分。

解放前一天，细雨蒙蒙，一清早，就从火车站方向断续传来零星枪声。当时我是个地下工作者，为了了解国民党军队的军运情况，数天前就每天下午装着闲荡的样子，到火车站附近遛遛。觉察到这几天军运突然多起来，总有七八趟列车往上海方向开去。或整车是军队，或装运坦克大炮，或是军需物资装备。我意识到这是国民党军队在败退了。而今天，军车比前几天更多，一列紧接一列，均向上海方面开去，向无锡方向的列车一趟也没有，客车已停驶两天了。沿铁路两侧，一批批散兵游勇，衣冠不整，狼狈不堪，惶惶然如丧家之犬。他们沿途打家劫舍，老百姓怨声载道，盼望着解放军早点过来。

根据这些情景，我就知道浒关镇即将要解放。我旋即去横宅村一带找到了澄锡虞锡东武工队，与他们一起研究如何迎接浒关的解放，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当时研究决定：首先组织浒关区临时政府，由武工队朱剑波负责，队员李阿木率基干民兵来镇上，由我带领去镇自卫团团部（包括雇佣自卫团）接收枪枝弹药和军需物品，然后去警察局

收缴武装警察的枪械，同时搜捕罪恶较重的伪职人员，尤其是自卫团的几个主要人员。谁知当我们到镇公所、警察局等处，一些主要人员已逃之夭夭，只有自卫团的几个中队长未走，我们就责令他们于一天内把所有武器弹药缴到指定地点。在收缴自卫团枪枝过程中，不是一帆风顺的，镇上四个自卫团中队，三个中队部的枪枝，迫于当时形势，他们如期缴给了我们；但其中一个中队属蚕种场的，却迟迟不缴，几经交涉，甚至请来了解放军的一位连长，在无可奈何下，为了应付局面，他们才缴了一些，直到以后经该场工人检举揭发，才把所剩枪枝弹药全部交出。

话再说到解放前一天的晚上，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维护社会治安，我们组织了一支武装队巡逻于街头巷尾，确保了浒关全镇人民度过了黎明前的黑暗，赢得了浒关的顺利解放。

4月25日，仍是一个细雨蒙蒙的天气。上午9时左右，人民解放军十兵团先头部队的一个排，首先到达浒关火车站。我们组织了各界人士冒雨前往车站欢迎解放军。各界人士心情都很激动，送茶担水慰劳人民子弟兵。紧接着解放军大部队，从铁路、公路、大运河边，由北向南，浩浩荡荡通过浒关，向苏州方向进军。

解放军军容整齐，个个精神抖擞，冒雨乘胜进军。在后续部队中，我遇见了许多在苏北根据地相处过的老战友，在进军途中相逢，多么令人高兴，只因各人革命事业在身：歼灭敌人的任务还很重，只好匆匆相见又匆匆分手，真是惜别依依，心中无限惆怅。此情此景虽隔40年，但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使人永远不会忘记。

5月1日，中共吴县县委、吴县人民政府、浒关区人民政府、浒关公安分局进驻浒关。县委在浒关蚕种场办公，县人民政府设在现吴县中学内，浒关区政府先设在猛将堂（即现影剧院）内，后搬到北津乔弄张根泉家，浒关公安分局设在和祥桥弄童家。浒关区临时政府撤消，朱回无锡工作。我由县委书记俞臻、县长傅宗华指派，出任浒关镇副镇长，成立浒关镇人民政府，在下塘33号张义良家办公（此处原为军统33号浒关小组的办公地点）。

当我公开露面出任浒关镇副镇长后，即遭到一些人的恐吓和威胁，他们别有用心地对我家属讲，“国民党军队就要打过来，八月半一定要回来，你家鸿海不要出来（工作），免遭杀身之祸”，同时还散布了一些对我不利的流言蜚语。我知道了这些情况，在浒关解放一星期后，就动员我的母亲和妻儿，去黄埭暂避，一旦真有变化，我可随部队一起撤走，家中可免遭不测。回想当时，只觉得幼稚可笑。

浒关解放后不久，即遭到敌机空袭，丢下两枚炸弹，敌机目标可能欲炸驻在南津桥附近壬戌馆的某军一师部，结果却把鸿云楼茶馆10多间房子给炸了，当时死伤了十几名战士和居民。事后，浒关镇镇长杨琼和我都到现场去察看和了解情况，并对此事作了一些安排。这是国民党政府欠下浒关人民的又一笔血债。

弹指一挥间，40年过去了，浒关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将永远记住过去的苦难，也将永远不忘1949年4月25日浒关镇解放的那一天。

参加抗日和赴缅作战回忆片断

胡永宁

1985年8月31日，我应邀参加由县政协、县委统战部召开的“参加抗日战争和支持抗日的老同志、老战士座谈会”。我作为当年的国民党第二〇〇师的一名连长，能够参加这个座谈会，畅谈当年抗日的战斗情景，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激动的思潮又一次把我带回那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战场……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着中华大地。那时，我在浙江省立衢州中学读书，出于一腔爱国热情和对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我投笔从军，考入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16期，立志杀敌保国。

1939年9月，抗日烽火遍及全国。我和同学们提前毕业奔赴抗日前线。我被分派在国民党陆军第五军（军长是杜聿明；副军长是郑洞国，现任民革中央副主席）二〇〇师（师长是戴安澜）六〇〇团三营任见习官。11月，随部队开赴广西南宁。在离南宁约五公里处遇上了日寇，于是短兵相接，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拼搏。在战斗中，团长邵一之不幸中弹，壮烈牺牲。这次遭遇战，我们取得了胜利，保护了大西南国际交通线。

1939年底，我随二〇〇师参加著名的昆仑关战役。当时，我们的任务是攻克昆仑关，夺取四四一高地，全歼被我军包围之日寇。昆仑关自古就有雄关天险之称，日寇占领南宁后，企图切断我华南国际交通线，并妄图凭借昆仑关的天险和坚固的工事牵制我军，利用空中优势，整天不断地投弹轰炸、机枪扫射。我们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下与日军作战，白天连炊事也困难。但我师官兵在戴安澜师长的指挥下，大家决心与阵地共存亡，经过七、八天的苦战，重创日寇，击毙了日军旅团长中村正雄，为这一场昆仑关战斗赢得了胜利。

接着，我军发动了夺取四四一高地的战斗。争夺战十分激烈，四四一高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最后终于被我军收复。后来，敌人再三改变战略进行反扑，均被我荣誉第一师各团击溃，二〇〇师各团也就攻占了昆仑关关口、东南界首高地。这场争夺战反复争夺阵地，伤亡颇大。由于后勤部队卫生队的密切配合，伤员及时送至后方军医院。后方的广大人民群众获悉我军与日作战赢得胜利，纷纷自动组织起来，拿了酒、肉、鱼、粮到前线慰劳我军。这样更激励了将士的斗志，全军各师团士气高涨，斗志昂扬，一鼓作气发动了全面进攻，全歼号称“钢军”的昆仑关守敌，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

1942年3月，二〇〇师编入中国远征军，开赴缅甸作战。我师系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装备精良。当时，由汽车前往畹町，自畹町到连腊戍后行军南下。3月6日，全师相继到达同古结集。8日，仰光失陷，英军告急，滇缅公路告危，日军北进追击。我师的任务是接守英军阵地，并掩护其撤

退。同古是阻击日军北进的一道屏障，也是日军北进的必经之路。因此，保卫同古任务十分艰巨。再加上三月的缅甸，正值盛夏季节，烈日炎炎，大小河流都干涸了。这对阻击日军北进极为不利，一场恶战迫在眉睫。我们在戴安澜师长指挥下，满怀杀敌保国之志，昼夜建筑工事，加强防御，迎接战斗的打响。我编在远征军的先头部队，胜败关系到抗战的大局。3月23日，日军用飞机、大炮轰炸我阵地，直至24日，日军从南、西、北三面猛攻同古，还毫无人性地向我六〇〇团施放毒气弹，我军伤亡惨重。城西北三营部分阵地被日突破。当时我是六〇〇团三营七连的中尉排长。我排受敌炮击伤亡多人，右翼排阵地只剩下班长1人、战士3人和1挺机枪，寡不敌众，终于被敌突破。营长戴攸龄在战斗中负伤下来，我排三班长汪顺喜被弹片炸穿肚皮，肠子挂了出来，痛得直喊叫。我一面指挥战斗，一面派人救护他，可是终因流血过多而牺牲了，死后一支枪还紧紧地握在手中。目睹这一切，更加深了我对日寇的仇恨，我的肺快要气炸了，全连全排官兵誓为同胞报仇，与阵地共存亡。阵地被突破后，在同古城中与日寇苦战了11天，不特掩护英军第一师安全撤退，并歼敌五千，拖缓日军攻势。月底，由于后方补给被日寇切断，我师陷入困境。奉命放弃同古，撤往色当河东岸，在原地支持。

同年四月，我参加了继同古战斗后的又一次战斗。当时，由于棠甘告急，我中路军被东西两路日军截断，有被围全歼之危险。我们六〇〇团奉命昼夜兼程赶往棠甘城郊时，形势已发生变化，发现日军已占领棠甘。于是，六〇〇团沿公路从正面向棠甘进攻；五九九团从侧面高地包围控

制棠甘。当天，五九九团占领棠甘到细摩公路四周高地，完全控制了整个棠甘城，六〇〇团则攻入城内与敌展开了巷战。当时，我是第一战连尖兵排长，我排的任务是搜索前进，消灭顽固势力。连队在装甲重炮火力的掩护下，迅速攻进城内。至傍晚，全团占领棠甘城，接着扫荡残余日寇。因巷道狭窄，房屋鳞次栉比，遭到了守敌的火力扫射，造成了很大的伤亡，六〇〇团刘少峰团长见状非常痛心。我排机枪手在我身边，英勇顽强，一连射死了十多名日寇，当再次冲入巷道时，被敌机枪击中，不幸牺牲。我立即接过机枪，利用地形优势，猛烈向敌人开火，不幸右臂中弹负伤，鲜血直流，被战士拖下来。这次战斗，直至深夜才肃清了凭险据守的敌人，保护了腊戍方面的大门——棠甘。

4月20日收复棠甘，日军已经北进。月底，腊戌失守，我们受敌包围，不得不放弃棠甘，进行突围撤退。我们二〇〇师被围在看不见天日的深山老林中，缺粮、少药、缺子弹，并经常迷失方向。肚子饿了，在深山密林里挖些芭蕉根充饥。缅甸的五月，正值雨季，大雨滂沱，道路泥泞，身上衣服从未干过。受伤战士的伤口化脓腐烂，一旦落伍，即遭群猴袭击。其时，我右臂伤口化脓严重，蛆虫叮钻，疼痛异常，但仍忍痛坚持。终于越出了望不到边的热带森林。艰苦的抗日岁月，真是终身难忘！

5月23日，我们沿细摩（细泡至摩哥克）公路向缅北退却时，不料中敌埋伏。25日在孟密特以北与日军主力激战一昼夜，才突围出来。但伤亡惨重，六〇〇团只剩下两个营的兵力，一个连只剩下五十多人。师长戴安澜在这次突围中，不幸身负重伤，终因流血过多，又以医药不济且遇